

[DOI] 10.19653/j.cnki.dbcjdxsb.2026.03.001

[引用格式] 司聪, 王薇.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6(3): 3-15.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 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

司 聪^{1, 2}, 王 薇^{1, 2}

(1. 西安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2. 西安财经大学 西部能源经济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剖析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要义, 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需要统筹战略与策略, 以战略定力从全局、长远、大势上确保“两个毫不动摇”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策略活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通过灵活施策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的发展环境, 本文以系统性制度安排、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层次实数融合、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线构建实践进路, 以期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充分激发国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战略定力; 策略活力

中图分类号: F120; F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6)03-0003-13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下文简称“两个毫不动摇”)[¹]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置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位置, 首次系统强调了该方针的落实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²]作为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 国内外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中国经济呈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新局面, 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 应从宏观战略高度坚定发展方向, 引领各种所有制经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 应从具体策略角度灵活施

收稿日期: 2026-0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3JBL011)

作者简介: 司 聪(1987-), 男, 陕西西安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 sicong@xaufe.edu.cn

王 薇(1987-), 女, 陕西西安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 wangwei_871020@126.com

策、精准发力，切实解决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中的难点与痛点。对此，应以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统筹把握所有制经济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强大合力。

一、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核心要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生产活动总是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或占有关系为前提。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交换的性质与实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形成与存续的基础，更是全部经济关系形成的根本前提，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并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一方针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初级阶段的要求，是由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3]。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依据这个基本国情，从实际情况出发。

同时，中国已步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十五五”时期，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首先，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交融，既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合并重整，又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兼并重组，还有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不断丰富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其次，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以渐进式改革打破所有制领域的路径依赖，统筹推动各类经济成分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育特征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性、渐进式的系统工程。最后，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态势并非始终不变。当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技术—经济范式推动所有制关系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所有制边界被重塑，催生出更具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所有制经济形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应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功能定位持续优化、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些现象表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互关系既取决于制度基础，又取决于实际条件。推动二者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一）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两对矛盾运动所体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支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表现为所有制结构要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4]，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及环节，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进而影响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或统治阶级垄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劳动者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这种结合具有强制性、异化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或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结合，又存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劳动者以雇佣劳动形式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还存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结合。这些不同的结合形态能够促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资源整合与互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延伸技术扩散路径、触发技术代际跃迁，引发生产方式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进而影响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场手工业以手工工序为基础开展分工，工人掌握部分技能，生产协作由资本家主导组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以机器体系为基础开展分工，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生产协作完全由资本家支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承担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分工安排，协作范围覆盖全产业链；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专业化分工，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提升生产经营效率；混合所有制企业依托股权结构配置与治理机制实现分工协作，有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第二，“两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各类所有制关系共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通过剥削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制度巩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已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国家发展需求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生产资料的归属权决定了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及产品的分配方式。“两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旨在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国家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抑制资本无序扩张，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三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迁推动经济基础发生变革，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 观照历史，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当旧的所有制束缚生产力发展时，新的所有制必然取代旧的所有制，重塑整个经济制度，进而引发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适应性调整。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演进过程中，中国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推进社会各阶层统一战线，持续深化政企分开，引导各类资本服务社会需求，有力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变革。

（二）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坚实基础

国民经济循环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既决定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和地位，又通过上述四个环节推动资源流动和价值创造，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有助于优化所有制结构、协调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坚实基础。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对生产环节的推动作用。一是在生产目标上，公有制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重点投入到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长周期、高投入领域，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需求。非公有制经济依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催生新的生产模式。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国有企业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关键领域集聚，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全产业链生产成本，并通过逆周期调节生产活动，

平抑市场波动。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以扁平化治理缩短产品设计周期，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凭借集群化组织培育技术创新集群，引发外溢效应，推动产业链由物理集聚向虚拟集聚转变，重构供给体系。

第二，“两个毫不动摇”对分配环节的优化作用。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占有，表现为生产的前提，而产品分配是对生产物的占有，表现为生产的结果^[6]。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占有权获取消费资料分配权，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工人获取工资，以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补偿，由此造成劳资双方分配关系失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立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一是优化公有制经济分配制度，发挥收益共享的制度优势，国有企业按规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统筹用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国家重大战略投入，并补充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二是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分配机制，依托技术入股、知识产权资本化等创新方式拓宽要素增收路径，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三是创新混合所有制经济分配模式，推动按劳分配与市场化绩效激励有机结合，构建多层次市场化分配体系。

第三，“两个毫不动摇”对交换环节的调配作用。一是在交换性质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交换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核心，市场交易完全围绕利润最大化展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主导的交换行为以服务社会公共需求为目标，聚焦基础性、公益性物资交换，旨在保障资源公平配置，维护经济社会平稳运行。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托市场供需参与市场交换，促进生产要素产权流转，通过多元化方式将生产环节创造的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收入，激发经济活力。二是在交换规则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经济活动与市场交易依靠市场调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催生资本无序扩张，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和资源争夺，导致市场主体权益分配失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通过储备调节、购销定价等手段，稳定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和交通等基础公共服务收费水平，弥补市场失灵；通过定向采购、普惠性供给等手段，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非公有制经济依托市场机制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拓宽市场准入渠道、吸纳城乡富余劳动力，在拓宽就业空间、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两个毫不动摇”对消费环节的促进作用。一是在消费能力方面，公有制经济承担公共资源的普惠性供给职能，配合政府统筹调控民生商品价格，稳定民生领域价格水平，缓解居民在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压力；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激发消费潜力；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市场供需，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二是在消费结构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行政手段确保基础消费品的正常供给，保障生存型消费。非公有制经济依靠市场主体差异化竞争，积极开拓细分产品市场，避免有需求但无供给的消费断层，壮大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形成兼具公平性和多样性的消费结构。

（三）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有助于完善经济治理机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是在政府层面，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作用不仅局限于维系供需平衡，更关键的是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推动宏观调控政策嵌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弥补市场失灵，降低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在市场层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7]¹⁸。民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能够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促使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充分挖掘产业、区域、城乡多层次内需潜力，精准补齐供需缺口；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二，“两个毫不动摇”有助于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一是从生产要素维度来看，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全过程。在物质资本维度，国有企业主导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稳定物质资本供给，保障产业发展安全。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资产周转效率。在金融资本维度，国有金融机构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股份制及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迭代创新，提升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在人力资本维度，公共财政重点投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提升居民的知识素养、职业技能和健康水平。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则顺应市场就业结构变化，依托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创新创业和灵活就业，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二是从生产关系维度来看，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集中布局，并依托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夯实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民营资本依托市场调节机制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倒逼资本方让渡部分权益，既能够缓解经济运行中的劳资矛盾，又能够解决传统体制内在激励不足问题，进而形成劳资关系治理的新范式。

第三，“两个毫不动摇”有助于健全产权激励机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所有制与所有权是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所有制是经济范畴，所有权是法律范畴。所有制是体现生产资料归属的经济制度，所有权是判定财产归属的法律制度^[8]。产权激励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对于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是公有制经济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产权制度为根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分别由全体人民、集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有效巩固国有资本在电网、铁路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控制力，切实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国有资本不仅能够参与非国有经济运营，还可以向效率更高的各类所有制企业流动，提升自身市场活力的同时，完成保值增值目标^[9]。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依托归属清晰的产权制度，合理划分企业内部治理权责，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灵活运用员工持股和有限合伙制度，以多元化股权结构推动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与市场化配置，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激发企业内生发展动力，提升经济运行效能。

二、“十五五”时期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定力

战略和策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论，是指导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战略是对事关全局重大问题的长远谋划。策略是在战略的指导下，针对特定问题或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10]。在战略层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现为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在策略层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现为适应性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机制。以战略与策略协同推进“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战略的坚定性能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策略的灵活性能够释放市场活力，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韧性。其次，战略的持久性能够在中长期锚定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策略的机动性能够在短期熨平所有制结构失衡引发的经济波动，兼顾改革任务与市场变化。最后，战略的全局性能够从宏观层面统筹协调，为各类所有制企

业统一市场规则、优化资源配置、稳定制度环境;策略的具体性能够从中观和微观层面靶向施策,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明晰市场定位、推动技术创新、健全管理方式,构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重塑。产业发展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关键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家愈发需要充分发挥战略定力的基础性、稳定性和保障性作用,从全局、长远、大势上系统谋划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战略布局,确保“两个毫不动摇”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一) 增强“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自信

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国家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后者先后以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理论支撑,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属形态,将其认定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任何发展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前者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后者则将私有制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协同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将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努力使市场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既是经济效率的重要来源,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甚至将市场化与民主化进行捆绑,极力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同时,“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自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2]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两个毫不动摇”经历了从初步确立到巩固深化再到部署落实的多轮政策变迁。党和国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全面深化改革,适时取消计划经济,避免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党和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3]这体现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明确立场与坚定信心。“十五五”时期,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使其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 坚守“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定位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7] 170}。“十五五”时期,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二者的战略定位不能仅以所有制属性来判定,而是要基于制度设计和功能取向统筹考量。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根本原因是二者具有共同的生产力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共同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规范、司法保障和政策支撑等顶层制度设计明晰二者的功能定位,引导其分工协作,构建良性竞争格局。二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功能互补。“两个毫不动

摇”解决了单一公有制结构难以适应多层次生产力要求的问题，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保障关键产业链自主可控、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立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进，持续优化所有制结构。三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协调共进。实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非代表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垄断市场，而是使国有经济的发展既要有量的规模，更要有质的优势。不再片面追求国有企业数量、国有资产体量，而更重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质效和国有资产质量，使国有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具有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14]。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生力军，在交通、能源、科技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有效激发其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坚定“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目标

“十五五”时期，全球经贸格局、中国人口结构将迎来深刻调整，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为代表的发展契机逐步兴起，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同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7] 262}。因此，需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更加坚定“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目标。一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5]。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应从发展生产力出发，以生产力的质态演进为方向，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目标。在制度层面，将公平竞争原则贯穿法律法规建设全过程，破除针对不同所有制主体设置的市场壁垒，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在体制层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国有企业牵头、民营企业深度参与的产学研协同攻关体系。在机制层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过股权合作实现技术共享与资源互补，凝聚创新合力，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因收入分配失衡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亦不能退回到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国有企业承担乡村振兴任务等举措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扩大就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夯实居民收入增长基础。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十五五”时期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策略活力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有机统一，二者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张力。“十五五”时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中国应聚焦改革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通过发挥策略活力，灵活施策于“两个毫不动摇”，厘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与手段的边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化解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内在张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共同壮大。

（一）优化市场调节策略

一是在供需策略方面，在供给侧，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依据市场供求机制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流转，使生产要素流向高附加值领域，盘活企业资源，扩大有效供给。在需求侧，增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洞悉和响应能力，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研发方向和产能布局，以新消费需求激发二者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依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创造机遇。一方面，国有企业发挥资源整合优势，牵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发挥机制灵活优势，深耕服务运营。二是在价格策略方面，在公共领域，针对国际大宗商品波动引发的国内价格波动，以区域平衡补贴和用量阶梯定价熨平波动。在竞争领域，强化激励约束，健全竞争机制，推动国有企业严控成本、提升经营效率。规范市场价格，为民营经济提供可预期的资源配置信号，引导民营企业合理制定竞争策略，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和可持续盈利能力。三是在竞争策略方面，明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定位，国有企业在军工、核能、电网等国家安全领域发挥控制作用，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在商业领域充分发挥竞争作用。民营企业应充分发挥经营灵活、市场反应敏捷的优势，在国家战略导向下快速感知和捕获商业机遇，聚焦科技、环保、康养等细分市场及农村下沉市场，抢占新领域和新赛道，以错位竞争策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丰富企业改革策略

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明晰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划分，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体系，发挥党组织在重大决策中的把关作用，确保企业发展服从国家重大战略。另一方面，深化现代公司治理，通过优化组织架构、推动专业化整合等方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推行市场化的劳动制度，搭建跨部门、跨子公司的岗位竞聘平台，采用任期制与竞聘制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薪酬体系，完善分配机制。二是深化民营企业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创始人、家族代表、职业经理人等董事会席位，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让渡经营权，鼓励家族企业创新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深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混改要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度^[16]。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出发，分层试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处于市场竞争领域、经济带动作用显著的国有企业，重点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其合理界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股权占比。依法平等保护混改企业的投资者权益，完善进入退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聚合各类资本，增强民营资本的混改动力，避免国有资本仅通过引入民营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却未能同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

（三）健全产权保护策略

一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为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平等保护产权方面，加快完善产权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类所有制企业在产权确权、交易、处置等环节的平等法律地位，破除各类隐性壁垒。在全面保护产权方面，拓展产权制度覆盖的广度与深度，既涵盖对物权、债权、股权等传统产权的保护，又包含对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新型产权的保护，还包括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产权保护，进而释放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价值。在依法保护产权方面，建立产权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动市场监管部门与工信、科技、版权、海关等部门协同执法，提升对侵权行为的打击效率，确保产权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建设现代化产权交易市场。搭建国家、省、市、县四级互联互通统一产权登记数字化平台，对各类产权实行统一赋码。搭建集产权评估、挂牌、交易、交割于一体的服务平台，破除产权交易壁垒，提升产权交易效率。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增资扩股和资产转让应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推动国有资本向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和国计民生关键领域集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民营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依法依规完善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通过规范的股权登记、信息披露等方式提升产权清晰度。

（四）拓展政府监管策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7]¹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相结合^[17]。“十五五”时期，在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平衡好政府监管与市场活力，将“两个毫不动摇”向纵深推进。一是明确政府监管标准。按照行业属性、规模特征、风险等级划定监管重点，厘清政府监管边界，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规范监管权限与程序。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规范外商投资准入，清单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内资与外资统一标准，清单内依规审批。以监管责任清单明晰政府监管职责，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明确相关部门与行业的监管职责。以刚性底线责任划定监管红线，依托柔性差异化监管灵活调整监管尺度，既要避免不当干预束缚市场活力，又要防止监管缺位引发市场运行失序。二是创新政府监管工具。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推动国有企业混改上链，对股权变更、重大决议存证留痕，强化对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预警，防范各类违规操作。依托大数据优化企业信用信息采集与公示，助力政府研判企业信用状态，动态调整监管策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市场活动支配者向市场秩序维护者转变，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四、“十五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实践进路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既要一以贯之，也要与时俱进。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的发展环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国家需要在战略与策略协同牵引下，坚定而灵活地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市场环境，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充分激发国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开辟实践进路。

（一）以系统性制度安排统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平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作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18]的重要内容。“十五五”时期，系统性制度安排既是界定“两个毫不动摇”制度边界的关键抓手，也是充分发挥制度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激励与约束作用的首要任务。

第一，正式制度安排。在公有制经济层面，坚持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市场竞争力为重要遵循，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廓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行政职责与监管职能，使其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配套制度，针对战略类、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细化经营管理标准，确保国有企业坚守公有制属性，实现功能定位与产权属性的有机统一。在非公有制经济层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制定配套法规条例，引导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布局，壮大民营经济队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配套实施机制，细化行政性垄断行为认定标准，明确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认定范围，保障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畅通外商投资服务渠道，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营造便利环境。

第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是国有企业应依托党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引导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决策中服务国家战略，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将质量和效益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完备的产业优势增

强对国民经济的牵引力和影响力。二是民营企业应弘扬企业家精神。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大做优做强。鼓励民营企业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稳定就业、参与公益慈善等方式推动共同富裕。三是各级政府应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尊重市场客观规律,精准对接企业诉求,主动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第三,制度实施机制。一是自我实施机制。国有企业应深化履责实践,持续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统分结合、权责明确、协调顺畅、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高标准履行国家赋予的使命。民营企业应根据自身优势和行业特性,探索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价值共创。二是双边实施机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明确双方出资比例、权责划分和退出机制,健全争议协调机制。完善分级授权管控体系,清晰划分各层级权责边界,对政策合规风险、市场经营风险实施分层分类管控,有效阻断风险跨层级交叉传导。三是第三方实施机制。各级机构需将宏观制度细化为操作指南和行动方案,明确责任主体、任务清单和执行标准,建立集立法、执行、监督、反馈于一体的动态管理闭环,切实维护企业权益,稳定政策预期,破除隐性壁垒。

(二) 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建立统一开放、高效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市场规模优势、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和破除隐性壁垒的重要手段,也是“十五五”时期开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活力企业互促共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局面的重要基础。

第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是建立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利用数智技术将分散的要素交易场景整合为区域性、行业性要素交易平台,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丰富要素供应方式,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破解传统生产要素在交易中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的痛点,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资源互通共享。引导地方、行业资源交易中心融入全国资源交易平台,推动各类资源的供需衔接和场内场外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建设高水平的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构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鼓励企业根据行业特性制定标准。推动国有企业的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向民营企业推广,以联合创新、培训交流等方式增强民营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服务标准对接,在交通、金融、医疗等领域,民营企业应对标国有企业的规范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运行稳健性;在互联网平台、物流等充分竞争的领域,国有企业应借鉴民营企业的客户导向型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

第二,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一是加快打造有效投资体系。健全政府投资机制,将政府资金优先投向市场难以触及的基础性、公益性领域,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链联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补链、延链、固链、强链。创新政府投资模式,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优化投资方向,评估投资风险,依托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市场投资机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沪市、深市主板赋能成熟期蓝筹企业,以创业板助力高成长性企业,以科创板服务硬科技企业,为各类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二是培育壮大国内市场。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施跨品类换新补贴方案,激发存量与增量消费潜力。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首发经济、假日经济、银发经济等消费经济形态联合打造零售、文旅、康养等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满足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三) 以深层次实数融合赋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发展

“十五五”时期,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正引发经济社会深层次变革。中国需要以深

层次实数融合赋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发展，将同质化、低水平“内卷式”竞争转变为数智技术赋能的竞争，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构筑多维数字创新生态。一是构筑数智技术创新生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突破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固有边界，开辟全新的技术发展轨道，增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支持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在应用场景驱动的前沿技术创新中发挥生力军作用，共同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推进模型库、知识库、数据库、方法库和人机接口的集成部署，打造能够深度洞察市场信息与环境、助力企业决策的工业和商业智能体，为企业提供科学、敏捷的决策依据^[19]。二是构筑数智产业创新生态。依托智能制造、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搭建智能化、融合化的应用场景，通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助力国有企业突破共性技术壁垒，摆脱低效生产方式，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助力民营企业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联合开发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以智慧供应链重塑产业价值链。三是构筑数字网络创新生态。依托5G、物联网技术构建数字网络，增强企业的市场信息捕获能力、商业机会识别能力，提升市场供需的响应效率。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市场分工，依托数字网络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互补、创新链协同的分工协作格局。

第二，打造全域数据资源体系。一是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开发通用数据模型，架设跨领域的的数据语义映射框架，打通跨行业、跨地域数据接口。推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使其在信息的采集、存储、流通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支撑企业数字化决策与智能化运营。一方面，促进国有企业有效整合生产、经营、管理数据，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体系，优化管理流程，在保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培育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的企业。二是建设数据可信流通基础设施。建立数据互联互通机制，明确公共数据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范围和程序，推动通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数据合作，促进企业、行业、区域间数据安全有序流通。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探索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稳妥推进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将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促进数据价值释放与共享。

（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联动发展

“十五五”时期，中国朝着制度型开放、双向投资协同并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系统性提升的方向深化演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与角色发生明显变化^[20]。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壮大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依然需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制度型开放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发展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一，深化对外经贸改革。一是稳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扩大开放，鼓励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依法合规设立合资企业，合理界定技术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专利实施许可条件和投资决策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二是完善重大外商投资项目服务机制，编制产业配套指引目录，建立梯度化政策激励机制，通过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普惠性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支持，引导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产业链配套服务，吸引外商深耕中国市场，将外资企业的技术专利、管理经验和品牌价值优势与本土的区位优势和下沉市场优势相结合，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协作的重要枢纽。三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增长动能和潜力，围绕

居民、产业、区域的多层次消费需求和消费能级差异,合理引导外资基于自身优势深耕布局中国市场。围绕产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重点领域,循序渐进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契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等自贸协定中的有益经验,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深化合作。

第二,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一是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优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布局。政府统筹规划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在交通、港口、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鼓励国有金融机构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在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发挥创新优势。将传统的“设计—采购—施工”模式升级为“立项—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促进机械设备、工程设备等货物贸易和项目设计、人力资源等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扩大中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有序开放,深化对外劳务合作。二是深化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制度创新,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建设离岸贸易服务中心,依托新型基础设施打造集仓储、展示、批发、零售、物流、售后于一体的智慧化跨境物流枢纽。探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技术标准互认、供应链协同、绿色低碳认证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助力高技术、高附加值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全面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7.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16.
- [3] 卫兴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70.
- [4] 逢锦聚.“两个毫不动摇”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26(1):56-67.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 [6] 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4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214.
- [7] 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8] 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5(1):4-24.
- [9] 洪银兴.中国经济学概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2024:157.
- [10]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85.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
- [13] 习近平.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J].求是,2025(6):4-9.
- [14] 任保平.高质量目标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框架与路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2):12-18.
-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7.
- [16] 吴宣恭.所有制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7:167.
- [17] 任保平,李培伟.构建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质生产力体系[J].求是学刊,2024(5):56-68.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54.
- [19] 司聪,任保平.“十五五”时期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的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6(1):3-15.
- [20] 赵振华.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内涵[J].中国社会科学,2026(1):68-78.

Strategic Resolve and Tactical Dynamism in Upholding and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SI Cong^{1, 2}, WANG Wei^{1, 2}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2. Western Energy Econom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Summary: “Unswervingly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unswervingly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sect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nsuring smooth flow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egarded “upholding and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 to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and ensuring that economic entities under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develop side by side” as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enhanc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economy faces a new situation with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upholding and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China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forms of ownership with strategic resolve and tactical dynamism, fully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all forms of ownership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essence of upholding and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serve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depend not only o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but also on actual conditions. Promo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ectors should uphold and improve China's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and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for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needs to advance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through strategies and tactic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foundational, stabilizing, and guaranteeing role of strategic resolve should be fully leveraged to ensure, from an overall, long-term, and macro perspective, that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align with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form, making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s more mature and well-def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lexibility of tactical dynamism should be utilized to fulfill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goals and mean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and common growth of all forms of ownership.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actical approach centered on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s,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level opening-up,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fully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development vital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nspira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Key words: commitments to the public and non-public sectors; public sector; non-public sector; strategic resolve; tactical dynamism

(责任编辑: 孙 艳)